



《张謇传》张孝若著 岳麓书社2021年1月版

图/视觉中国

俄罗斯女皇普鲁士公主老家在波兰

孙欣祺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位老家在波兰的普鲁士公主。这个看似荒谬的事实怎么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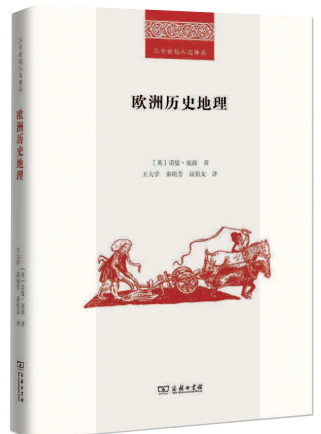
英国人诺曼·庞兹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在《欧洲历史地理》中以至繁的方式作出极筒的解释：近代欧洲国家的疆域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本书以时间为主线，将“（欧洲）大陆广阔的空间模式看作一个整体”（第五页），从多角度梳理各国千余年的版图变迁，其分析之具体、细节之详实，堪称欧洲历史地理的简史百科。

要读懂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并不容易，因为读者本身需要对纷繁复杂的欧洲历史、地理、政治具备相当的认知基础，否则难免陷入“叶卡捷琳娜二世祖籍”的困扰。但如果带着此类问题去书中寻找答案，便可产生触类旁通的顿悟感。

准确地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29年出生在普鲁士王国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即今天的波兰什切青。她是安哈尔特-查尔布斯特亲王之女，在德语里，国王、公爵和亲王的女儿一般称为“Prinzessin”，译人中文，即为“公主”。这就是在中文世界里，叶卡捷琳娜二世被称为“普鲁士公主”的缘由。在她出世前九年，这块自中世纪初就由波兰人占领的地区为普鲁士人。在欧洲历史长河中，斯德丁多次易主，但普鲁士人无疑是最突出的那一群。

用15世纪学者乌尔里希·穆蒂乌斯的话说，“德意志就是‘那些说德语或者任何一种德语方言’的地方。”对语言的执著产生了一种“德意志沦陷区”意识，即“真正的德意志仍有部分被他人控制”（第261页）。比如当时的历史学家康德·策尔蒂斯写道：“我们著名的港口但泽被波兰人控制。”在庞兹看来，共同的语言和经历，乃至共同的敌人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促成欧洲国家统一的主要力量”（第261页）。收复则驱动了战争。在“德意志沦陷区”的指引下，普鲁士人抢占了邻国波兰的土地，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故乡斯德丁划归己有。不仅如此，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还在几十年后与俄罗斯、奥地利联合瓜分波兰，将这个国家的名字从世界地图上抹去。而参与瓜分的俄方首领，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不曾想到，“什切青”会在百余年后重现江湖，她的老家改回了波兰名和波兰籍。

从国家的维度看，波兰有着一段很长的动荡史，然而从欧洲大陆整体分析，“从1519年查理五世皇帝继位到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地图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第305页）这是因为“波兰屈从于俄罗斯、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等邻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之下”（第306页），成为了大国之间相互制衡、保持均势的棋子。当然，即便是一生执棋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难免成为棋子；她被姨母伊丽莎白女皇相中，在腓特烈二世的安排下嫁给俄国储君，这本身就是欧洲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王族政治联姻。



《欧洲历史地理》[英] 诺曼·庞兹著 王大学、秦瑞芳、屈伯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年12月版

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

严泉

《张謇传》是张謇先生（1853—1926）的人物传记，原名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者是传主之子张孝若。张孝若以父亲自订《年谱》为骨架，以新兴的白话文书写方式，详细记录了张謇的辉煌一生。正如作者所说，“我做这篇传记所依据的东西：不是我亲眼所见的，就是见于我父著作，或亲友传述的。我必诚诚恳恳，原原本本写出来，没有一句假造粉饰的话，也没有一件靠不住铺张的事。”这部20多万字左右的传记甫一问世，在当时就引来不少社会关注，出现一股不大不小的“张謇热”。

如何评价张謇，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孝若自己也承认：“我构思设计，要作我父的传记，转眼将近二年了。有时候已经要动笔，但想到写我父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得妥当，反而失掉我做传记的本意。”其实，一直以来关于张謇的研究，不仅富有争议性，而且他的历史遗产是被低估的。重新发现张謇的时代意义，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张謇精神的重新发现。正如21世纪初南通的主政者罗一民所说，张謇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城市精神就像人的灵魂，像我们说的核心价值一样，能代表整体状态。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与不好，要看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精神动力。张謇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时候，也打造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南通近代的南通精神是张謇一手孕育出的，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张謇是一位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人。张謇作

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同时代的人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张謇没有读过新式学堂，也没有正式出国留学，他的弃旧趋新便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他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了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俞樾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张孝若也曾经形象地刻画了自己父亲的改革形象，“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张謇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者，更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在实业领域，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第一个气象台“军山气象台”、第一个现代化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在教育领域，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本科制民办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在文化与慈善领域，他创办了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盲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等。近代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不仅是对南通与地方治理而言，还包括整个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民国成立后，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局总裁。任职期间，张謇不仅致力维护共和政体，而且全力实践他实业救国的理想，采取了制定经济法规、制定税则、对民用企业实行奖励补助等措施，力促振兴实业。所以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的社会影响力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其辐射作用决不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威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

如果同美国的开国人物作一个比较，张謇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一书作者罗恩·彻诺认为，汉密尔顿集思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和新政府架构的主要建筑师，汉密尔顿设计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平稳运转的一整套机制，包括一个预算体系、一个长期债务体系、一个税务体系、一个中央银行、一个海关系统和一

支海岸警卫队。凭借这些举措，他为“行政能力”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如果说是杰斐逊谱写了美国政治论述的必要华丽诗篇，那么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拟就了美国的治国术散文。”

作为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张謇的爱国主张和救国实践对百年中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一就是伟大的爱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美，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编者注：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习近平还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具有研究与借鉴的意义，而且对一个时代来说，更是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精神坐标。历史学家姜义华先生认为，张謇有着世界的视野和宏大的理想，但始终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从一件一件实事做起，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表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个体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精神与与自然谐适的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的特征。

时代的变革离不开张謇精神，从近代到现代，张謇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罗一

民评论说：“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张孝若也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10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固的成见”。科学与人文主义同样是张謇精神的内核。吴良镛院士认为，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重要原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曰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期望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

当时在中国富有影响力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裴德生在实地探访南通后，于1921年3月26日发表的题为《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文章中称：“通过南通这个模范城市的建造，张謇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树立了里程碑，孤立于那些受外国影响的城市之外，没有铁路带来的便捷，也没有走商发展的寻常路线。南通成为张謇与其同僚和亲属（包括其子张孝若与其兄张謇）行政才能、视野与组织能力的不朽作品。”因此，重新定位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无疑是一种治理现代化近代本土资源的再发现，具有丰富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札记

1898年中国之行，伊藤博文看出了戊戌变法的问题

郑渝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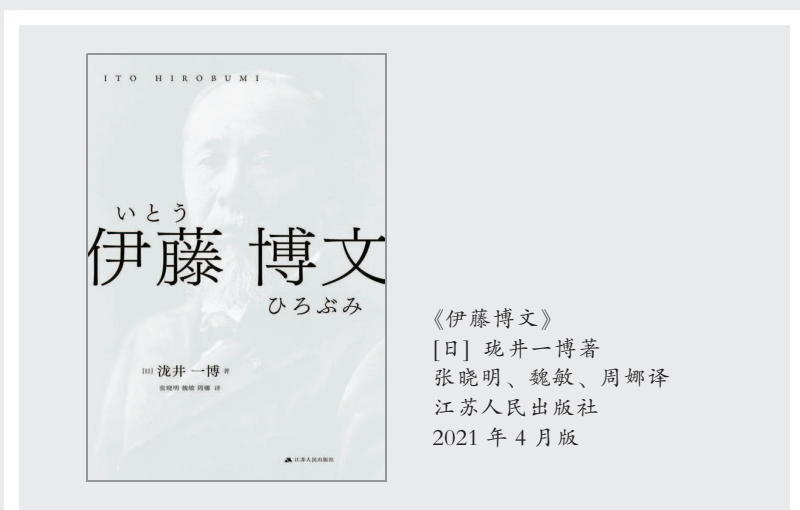
1898年，伊藤博文从日本长崎出发，开启了中国之行。伊藤博文对他的中国之行抱有很高期待，而中国清王朝的政要也有同样的期待。

伊藤博文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还担任过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创立了立宪政友会。甲午战争正是伊藤博文一手发动，其后更是强迫到日本磋商的中国清王朝重臣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胜，伊藤博文成为了第一任对韩国的统治总监，也就等于英女皇派驻到印度、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总督，但日本对韩国当时的统治方式是相当残暴的军事统治，所以，伊藤博文被韩国民众深深痛恨，1909年被韩国义士刺杀身亡。

在1898年的时候，虽然当时的中国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已经见识过伊藤博文的凶恶一面，却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待其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推手的身。伊藤博文本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动人员和领导者，并一手推动日本颁布了宪法，让当时的日本从封建国家跨入了近代国家行列。

当时，中国清朝的光绪皇帝主持展开了维新变法。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光绪皇帝提供变法垂询。9月20日，光绪帝接见了伊藤博文。

但情势却令人惊愕地转向了剧变。



《伊藤博文》[日] 瑠井一博著 张晓明、魏敏、周娜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版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起了旨在清除变法派的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多名变法干将被捕，而名气最大的变法派康有为、梁启超则逃亡。伊藤博文在这期间写给夫人的信中所感慨，“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传变法派）企图排除皇太后……实难知晓中国之事。”

日本国家制度史研究专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瑠井一博在其所著的《伊藤博文》一书中根据伊藤

博文本人的书信、讲话以及其他史料分析指出，意外地目睹了清朝变法派被一夜间肃清的伊藤博文，对清朝政治产生了深深的信任感。伊藤博文来华之前、之初，就意识到戊戌变法推进太急，且缺乏权力支持，而变法派因为李鸿章曾经执掌北洋而北洋力量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所以排斥了更具政治能量的政治家李鸿章，这也让伊藤博文深感失望。所以，1898年9月18日，伊藤博文在北京见到康有为时，相当敷衍后者。

《伊藤博文》书中用了较多篇幅介绍伊藤博文是如何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狡黠而不乏耐心的权力运作，不断挑动日本政坛力量分拆、重组，从而以渐进方式推动日本的现代化。伊藤博文的改革（革新）理念是，国家要改变积贫积弱，最根本的要发展学校，培养人才，用新人才来支撑新制度，用新人才来取代旧官僚，而新人才才能领导军队变成更具战斗力的近代部队。“在他（伊藤博文）的思想中，人才是运作制度的关键”。

所以，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清朝的戊戌变法虽然经由皇帝推动，却推进太过迅猛，而且主导者（无论是皇帝还是康有为等干将），对于制度的理解太过浅薄，以为引进西方的国家制度就马上可以让清朝中国变成强国，而没有更具耐心地在教育、军事、文化等方面下功夫，更没有先行让国民变成近代的国民。

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思路，被伊藤博文认定存在巨大缺陷。康有为从儒家思想宗教化的倾向，这恰恰是伊藤博文所警惕的。伊藤博文在推动近代日本改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日本传统的宗教进入教育以及国家体系，推动国家的世俗化。

虽然如此，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依然竭力救援变法志士。这

当然与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大佬意识到变法志士的存在，可以成为拿捏清政府迫使其作出更多权益让步的棋子有关。但总体上，伊藤博文虽不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却认为他们发起的变法失败，更多的不是其个人奋斗的事业失败，而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受阻，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也不无担忧（这显然也是因为担忧清末中国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为其它列强更深程度卷入提供口实）。

瑠井一博在这本书中指出，伊藤博文1898年的中国之行，也就是形成了政经分离的中国观，也就是说，通过对鲁莽的戊戌变法以及残暴的镇压变法的观察，伊藤博文彻底失去了对中国清王朝自新的信心，相信单靠中国自己当时的发展已经不足以抵挡欧美列强——这促成了日本国内的政界、军界、企业界少壮派精英以所谓“东亚共存、共荣”为借口，加快对华以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渗透、侵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相信中国的实业界即便依旧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也可以发展出至少与日本相当的工业经济水平。这也成为了刺激日本加快侵略中华的奇理理由，因为如果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日本却旁观一边，那么只会被列强彻底排除在外。